

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

潘新和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

潘新和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潘新和著.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ISBN 7-107-12259-2

I. 中… II. 潘… III. 汉语-写作-教育思想-中国 IV. H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1320 号

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

潘新和 著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09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华云电子数据中心照排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75 000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20

ISBN 7-107-12259-2
G·5369 定价 14.3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从中国写作和写作教育理论的历史传统出发

——潘新和《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序

孙绍振

写作学界终于有了这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写作和写作教育思想的专著，这是我所乐见的。

中国当代的写作和写作教育理论一直处于幼稚的状态，从科学发展的阶段上分析，恐怕只能划入草创阶段。这是因为，写作学还没有真正属于它自身的基本范畴（话语）体系。几乎所有的范畴都是从相邻学科，例如，文艺学、现代汉语、逻辑学等等中原生借用的。因而就产生一个现象，所有这些范畴都并不包含写作学本身的特殊性，有的只是相邻学科的原有的内涵。这些内涵有些是比较深刻的，有些本身就很零碎，很贫乏，一经搬用就更加支离破碎了，例如关于主题的范畴，就只有简单的、粗糙的、贫乏的规定，而没有内在的丰富的深刻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还没有从抽象的直观上升到多种规定性的统一。这种现成观念照搬的现象，极大地妨碍了写作学科对于自身规律的科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这样幼稚的错误，主要是因为，中国当代写作学者至今仍然缺乏写作学本身特殊的价值取向的自觉。写作学在价值取向上的依附性，主要表现为依附于文学理论。而文学理论长期以来又依附于认识论哲学，文艺学的这种缺乏独立性的倾向至今（包括最新引进的后现代主义文论）没有得到根本的克服。

如何从意识形态理论的笼罩下解脱出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一大课题。

写作学比之文艺学更低一级的依附性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至今还没有认识到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最关键的是明确自身独立的价值取向。这就使中国写作学在价值取向上追随相邻学科的倾向更具盲目性。当文学理论，在80年代中期，为了从哲学的演绎中挣脱出来，急病乱投医，到一些横断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学科中去找寻方法时，这本身就是有很大局限的，但是处于幼稚阶段的写作学居然不顾自身的特点，白白当了几年文学理论的跟班，结果是和文学理论一样一无所获。不但白白浪费许多精力，反而造成价值取向上的更不清醒。

所有这一切必要的和不必要的代价，都在提示我们重新思考严格的学科理论究竟应该怎样建构。

本来，一切理论的建立，应该是从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实的实践过程中总结起来的。最佳的途径是直接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系统的范畴来，这就要进行原创性的科学抽象。但是由于原创性的科学抽象极其艰难，一般地说，只有大师级的学者，如亚里士多德、孔夫子那样的人物才能站在时代智慧的最高点上，作出当时最深刻的概括，一般的人，都只能在前人积累的思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二度概括。就是进行二度概括也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人们不得不从相邻学科，也就是比较发达、先进的学科中吸收某些成果，来带动自己的抽象力度和深度。但是相邻学科，所有的成果，不管是多么先进，也不可能直接提供本学科以外的现成成果，因而借用者必须有一个批判（或者客气一点，用皮亚杰的话来说，同化——assimilation）的过程，经历这个过程有如横越一座山脉一样，是非常艰巨的。然而这种艰巨性，被写作学界忽略了。因而我们付出整整十年的代价，而仍然从这家邻居的园子转到另一家园子中津津有味地挤在一起。尽管在具体问题上，许多同人有着各式各样的不同

见解，但是在方法论上，在价值取向上却非常有意思地失落了自己的家园。

对于这种学术上真正的误区的可怕、可悲的程度，并不是所有的把生命献给写作学的同人都有清醒的认识的。这就造成一个现象，真正的学术研究非常稀少，而低水平的教材却出了据说是上千种。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教材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比较高级的通俗读物，它的任务并不是作学术的突破，而是将已有学术研究的成果进行普及。在没有多少学术研究成果的时候，却出现超量的普及性读物，这种为无米之炊的现象，不是一大怪事吗？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一些同人能够以他们的研究表现出他们对于写作学界这样的状态持清醒的态度，我就不能不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了。

这正是我特别推崇潘新和先生的这本《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的一个原因。

当许多学者在相邻学科借用的概念和范畴中作着重复性的、平面滑行的时候，潘先生显然是从这些表面的轰轰烈烈中感到内在的空洞。许多基本的观念和范畴，往往是只有简单的直观，不但没有内涵的深化，而且没有历史的过程。从方法论来说，就是逻辑的方法，离开了历史的方法，就不能不陷于浅薄。因而大量的术语，就不能升华为范畴，充其量只能以某种准范畴的形态出现，这样的术语就不能不以内涵的贫乏为特点。在术语与术语之间，其关系长期处于零乱、不统一、不系统的状态。在现有的几个颠来倒去的观念中不但不可能自我深化，而且不可能摆脱贫困概念的恶性循环。

正是这样的情况不可能使潘先生满意，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写作和写作教育理论的数千年的历史。

在那里有名符其实的宝库。作为这个宝库的基础的是中国历代文章浩如烟海的经典作品和文献。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写作理论从来就是把研究的目标定在写作过程本身之中，不像我们过分重视的

西方文学理论，其中过多地充斥了哲学的思辨。从写作学的价值取向来说，中国写作的传统理论，更具有写作学本身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潘先生的选题本身就表现出他的洞见。更何况，他对于从先秦到现代的写作教育的历史资料的重新整理和审视，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在才力不足的人那里，如此浩淼的历史文献中，很可能是会迷失方向的。令人欣慰的是潘先生不但没有迷失，而且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文献中都进行了原创性的科学抽象，得出他独特的第一手的结论，诸如庄子的“道法自然”的自然主义，墨家的“论求群言之比”的理性主义，荀子的“正名而期，质请而喻”的唯物主义，王充的“疾虚妄，归实诚”的功用主义，刘勰“征圣、宗经”的古典主义，韩愈的“闾其中而肆其外”的复古主义，乃至曾国藩的“行气为文章第一义”的主体性写作思想，等等。潘先生以个人之力完成了一件本来是要集多人之功才能完成的大任务。

值得我们重视的还不仅是他对于中国古典写作学理论的第一手梳理，而且还在于他站在中国当代写作学的立场上对这么复杂的现象和理论给以命名。虽然这些命名，也就是他归纳出来的观念（有些可以说已经上升到了范畴），使得中国的写作学的术语和范畴一下子增加了一个完整的系列。其中一些概念和范畴还得到相当丰富而又具有深度的分析。有些分析不但对于写作学，而且对于文学理论也有深刻的意义。比如，他对于《文心雕龙》的阐释，对于文学理论界可能就震聋发聩。他以相当雄辩的质和量的分析，阐明了《文心雕龙》就其本来面目来说，是一部写作学理论著作，而不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在我看来，他的这一论述，从根本上动摇了《文心雕龙》基本上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的说法。在这方面，他代表了写作学界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自信，一直依附文学理论的写作学居然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对文学理论有声有色地造了一次颇为像样的反。显示了在这个方面某种的学术的平等，甚至是小小的优势。当然，在未来的学术历史上，他的这个说法也许还有待于争鸣，但是，

他的这个说法的出现，也许是标志着《文心雕龙》单纯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去研究的历史的终结。不管以后的学术历史如何变幻，潘先生此一课题，对于中国写作教育学，开辟草莱，功不可没。除此之外，他的贡献还在于，对于中国古代和现代的经典理论家的阐释，常常有十分警策之处。尤其是对于梁启超、夏丏尊、朱光潜等先生写作学术思想的研究，更具有现实的实用价值。

写作学在中国当代学术领域中，所处的地位是较为卑微的。虽然，说起来难听，但是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许不能完全归咎于外部的成见，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写作学自身的发育不良。这种不良状态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是很可能成为绝症的。现在特别需要的是，不是一个，而是一批有志者，力避浮躁，甘于寂寞，下死功夫去作看来是冷门的学术性的研究，首先把学术成果积累在最普通、最常见、最基本范畴中，而不是随意地从相邻学科中引进一批了事。也许要经过一代乃至两代人的献身，才有可能改变写作学对于文学理论以及其他学科的低级依附状态。

正是出于这样的忧虑，我才对潘先生的这部也许是不免有草创学科痕迹的学术著作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同时对于潘先生的未来，表示了期待和热望。

1997. 2. 17

目 录

上编 古代部分

第一章 中国古代写作教育思想综论·····	3
第一节 先秦时期写作教育思想·····	3
第二节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写作教育思想·····	11
第三节 隋唐宋元时期写作教育思想·····	19
第四节 明清时期写作教育思想·····	27
第二章 中国古代写作教育思想专论·····	35
第一节 有德有言 述而不作·····	35
——孔子博文约礼、修德述旧的“读”本位言语教育观	
第二节 知者不言 善者不辩·····	43
——《老子》《庄子》“道法自然”的自然主义言语教育观	
第三节 言务为智 言务为察·····	52
——墨家“论求群言之比”的理性主义写作教育观	
第四节 正名而期 质请而喻·····	61
——荀子“以正道而辨奸”的唯物主义写作教育观	
第五节 感伪起妄 源流气蒸·····	69
——王充“疾虚妄”、“归实诚”、“为世用”的功用主义写作教育观	

第六节	道沿圣以垂文 圣因文而明道	81
	——刘勰“原道”、“征圣”、“宗经”的古典主义写作教育观	
第七节	言要其中 文济于用	104
	——韩愈“阅其中而肆其外”的复古主义写作教育观	
第八节	文本于道 文便是道	115
	——朱熹“理精后文字自典实”的唯理主义写作教育观	
第九节	自撰为主 取用为辅	123
	——唐彪“为文章”亦“为功名”的折衷主义写作教育观	
第十节	学为实事 文非空言	137
	——章学诚“有体必有用”的唯用主义写作教育观	
第十一节	不求理法 但求气昌	149
	——曾国藩“行气为文章第一义”的主体性写作教育观	

下编 现代部分

第三章	中国现代写作教育思想综论	161
第一节	清末民初时期写作教育思想	161
第二节	五四时期及 20 年代写作教育思想	171
第三节	30 年代写作教育思想	182
第四节	40 年代写作教育思想	198
第四章	中国现代写作教育思想专论	213
第一节	能予人规矩 不能使人巧	213
	——梁启超“研究文章构造之原则”的新文本主义写作教育观	

第二节	提纲挈领 条分缕析 平允公正·····	224
	——陈望道建构“有组织”的作文法的结构主义写作教育观	
第三节	发表是吸收的利器 用活语言作活教法·····	235
	——胡适不拘成见、“思想比较自由”的理想主义写作教育观	
第四节	先学注音字母 深究国语文法·····	246
	——黎锦熙追求时代“新潮”的现代主义写作教育观	
第五节	内容的充实 技巧的上达·····	260
	——鲁迅“思想性”、“文学性”统一的革命现实主义写作教育观	
第六节	察学生学力时间 顾学生兴趣需要·····	271
	——阮真“立论最重逻辑”、“最切实际”的科学主义写作教育观	
第七节	不能只靠规矩 还要努力锻炼·····	282
	——夏丏尊法则加练习的知、行合一的实践主义写作教育观	
第八节	要有切近的目标 要有假想的读者·····	294
	——朱自清从实际写作中体认教学机理的实用主义写作教育观	
第九节	养成纯正的趣味 克服心理的懈怠·····	305
	——朱光潜立足于学习主体人格心理品质建构的人本主义写作教育观	
第十节	本于内心的郁积 发乎情性的自然·····	317
	——叶圣陶以生活为源头、以学生为本位、以阅读为基础、注重“求诚”的主体性写作教育观	

上编 古代部分

第一章 中国古代写作教育思想综论

第一节 先秦时期写作教育思想

从西周（约公元前 11 世纪—公元前 771 年）到秦这数百年，是写作教学的发端。其教育思想主导特征是以教化、修己为基本目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一、西周的官学教育，其培养人才是倾向于通过提高人的道德品性来达到的。在《礼记·大学》中，对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其具体的教育目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重心在于“修己”，是通过“修己”达到“治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自然，写作教学也概莫能外。

二、从“文”字的语义看，它本身就包含着“文章”跟“教化”的双重内涵。《说文》称“文”，“错画也”。即“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也。”所以，“合集众字以成篇章”为“文”；“道之显者”，体现了“礼乐法度教化之迹”，也称为“文”。在实际运用中，“文”字也往往兼有二义。如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①，这个“文”字，就既指“诗书六艺”，也指其中所显示的“礼乐法度教化之迹”。文章关乎教化，也可以从王充在《论衡·佚文篇》中所举的“五文”得到证明。王充说：“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这里“文德之操”的“文”就是指礼乐法度、德行教养，不是指一种文体。可见，一直到东汉，文章跟教化还是相提并论、视如一体的。

西周的官学教育，继承了前代以“六艺”（礼、乐、射、御、书、

^① 《论语·学而》。

数)为教学科目的制度,其中的“乐”教是一门主课。“乐”教中的“乐语”教学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这几项。“兴”,指比喻;“道”,指借古论今的启示引导。“言”、“语”指的是发表言论与应承答对这两种文体。可见,这里的兴、道、言、语教学,大约便是最初的写作教学。“乐”教的教化功能是首要的,所以《礼记·乐记》中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官学衰落,孔子开私学之风,他仍然沿袭西周教育的内容,以“文、行、忠、信”四教为教学目的,即对学生进行文学、品行、忠诚和信实的教育。孔子还将他的一些学生分归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固然这里的文、文学、言语等概念与我们今天的含义不完全相同,但也都涉及有关写作教学的内容。

在这之后,齐国官办的高等学府稷下学宫,采取各学派自由讲学、争论的方法,吸引了众多的学者。他们在阐述见解、辩论驳难中,也论及一些写作问题。曾经在那里讲学的孟子、荀子等人都谈到了言与人的关系,言与道的关系等。这表明,如何表情达意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在教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上述的写作教育活动,它的发生与特定的存在形态,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写作实践与对写作的认识水平所决定。

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的全盛期,文化的发展已有一定的基础,思想情感的传达交流,政事、历史的记录显得十分必要。书写用的物质材料不仅有铜器、甲骨,还有竹简、帛等,为书面语的广泛运用创造了条件。诗、文的写作已较为发达。见于《诗经》中的许多诗篇已被创作出来,诗中大量运用赋、比、兴等手法,这表明人们在语言表现上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吟诵这些诗歌成为几乎一切社交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周礼规定乡间的官吏举行宴会和其他的祭祀仪式,诸侯宴请群臣和宾客,习射之前,大学开学典礼等,都要吟唱《诗·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或《国风》中的

《采蘋》《采芣》，《周颂》中的《雍》等诗篇，而《诗·大雅》里几乎全是祭祀时的乐歌。可见当时学诗、懂诗已成为贵族乃至庶人所必需的文化修养。散文的发展也较为完备。在早期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已见散文之雏形。《尚书》中的一些篇章，在叙事与说理上已比较细致，初具记叙体式与论说体式的表现形态。春秋战国时期史传散文和诸子散文的兴起，促成文体形式的进一步完善，把记叙和论说这两大类文体的写作推向一个高峰。史传散文《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堪称早期记叙类文体的代表，它们在写人记事上的简洁、生动与传神，都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诸子散文《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堪称早期论说类文体的代表，它们中的许多篇章，其思想的机敏与论说的雄辩，均令人叹为观止。这种文化背景必然导致对写作现象的最初的思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写作的本质。《尚书·舜典》对诗的本质作了最早的概括：“诗言志”。此后的先秦诸子基本上将此奉为圭臬，表示了类似的想法。例如孔子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①就“诗言志”的原始内涵而言，当是切中了写作的本质的。但由于先秦诸子在哲学观上存在着分歧，所以，他们对“志”的内涵的理解也必然是有差异的。言志，未必就是指真实地表白内心。孔子对《诗》的评价是“思无邪”，这一评价的出发点就不是指思想情感的真伪，而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论其邪正是非。因为孔子的哲学观是道德伦理化的哲学观。荀子则直截了当地主张文章要“法先王”，“顺礼义”^②，“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③。即作者的心志，要秉承先王的法统，要符合“道”的精神，心道一

①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② 《荀子·非相》。

③ 《荀子·正名》。